



96 鲁迅与中外文化

厦门大学出版社

鲁迅与中外文化

福建省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组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龙岩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2.5印张 265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615—0034—3 书号：10407·002
I·1 定价：2.10元

序

本书是福建省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我被邀参加这次会议，但因事未能出席；而全国学术讨论会是参加了的，中心议题也是“鲁迅与中外文化”。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同一思想文化背景的产物。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外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日益繁盛和深入，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更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现实的需要使人们不能不思考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西方文化及中国传统的关系。事实上，围绕这个问题的思考与争论是贯穿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全过程的，我们应该重视以往历史进程中的全部经验和教训。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鲁迅与中外文化”必然会成为学术界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不仅因为鲁迅那一代人走过的道路和所遇到的问题同今天确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鲁迅自己的经验和见解都带有深刻的历史特征，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本世纪初，当鲁迅怀着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来到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热忱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候，他就广泛地接触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而且面对当时在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各种争议，他第一次提出了如下的见解：“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于国中，翕合无间，外

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这里所提出的中外文化结合的思想，虽然带有直观的性质，但同时也具有认真思考问题的全面性。到“五四”时期，鲁迅积极投入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为了反对封建性的国粹主义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想，他坚定地致力于对旧文学和旧道德的否定和批判，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建立了“伟大的功劳”。与此同时，鲁迅又强调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看镜有感》），这是符合当时的现实要求的。同“五四”时期的许多先驱者一样，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是自觉追求的，同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则是自然形成的；其发展方向就是要使外来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优良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鲁迅说他写小说时“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又说他后来的作品（如《肥皂》、《离婚》等）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种从学习、借鉴到脱离，就体现了对外国文学的一个吸收与融化的过程；也就是使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革新。

到了三十年代，随着中国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正是在“如何使新文化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思索与讨论中，对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经过认真思考，总结了本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提

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的主张，体现了人们对中外文化关系的认识所达到的新的科学水平。鲁迅旗帜鲜明地主张对中外文化遗产首先要敢于“拿来”，他既批判了那种在中外文化遗产面前徘徊不前的“孱头”，又批判了那种为表示自己“革命”而拒绝、排斥中外文化的“昏蛋”，同时也批判了那种对中外文化遗产采取羡慕态度而欣然全盘接受的“废物”。“拿来”之后，就要“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对人民有营养的，就利用；对于既有毒素又有用处的，则采取吸收和利用其有用的一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对于人民毫无用处的，则除留一点给博物馆外，原则上都加以毁灭。这里所强调的是要有明确的主体批判意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占有”、“挑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取得借鉴，推动自己的创造。他曾说：“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论“旧形式的采用”》）。这“变革”与“创造”才是拿来主义的真谛；所以鲁迅说：“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集中地表现了本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进行长期探索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它已经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并将继续经受检验。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曾明确地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我以为今天依然如此，在对待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仍然要坚持“鲁迅的方向”，这是不能动摇的。当然，随着变化了的新情况和面临的新问

题，鲁迅当年探索的结论也需要不断丰富与发展。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就从不同的角度对许多问题作出了新的研究和阐发，而且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便为新文化的建设作出更好的贡献。但“鲁迅的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拿来主义”的思想应该成为我们对待中外文化的根本原则。这是鲁迅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必须珍视并予以丰富和发展。我想这就是学术界对鲁迅与中外文化这一问题深感兴趣的原因，而且在深入探讨中是一定会有新的收获的。

王瑶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王 瑶(1)
试论鲁迅的中外文化观.....	邵伯周(1)
文化引进、交流和“新人”、“新文艺”	
— 论鲁迅后期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许怀中(21)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 试论鲁迅自觉学习马列著作的革命精神	
	王建中(36)
“拿来主义”与“两脚踏东西文化”异同论	
	万平近(49)
鲁迅论文艺的承传和独创.....	郑松生(68)
鲁迅与外国文学.....	蔡师圣(81)
鲁迅，中国现代记叙抒情散文的奠基人.....	俞元桂(98)
鲁迅小说艺术形象的文化批判内涵	刘家鸣(110)
“鲁迅与庄子”新议	甘竞存(126)
鲁迅对进化论的择取和扬弃.....	程致中(144)
鲁迅早年张扬的“摩罗精神”	
— 读《摩罗诗力说》.....	黄克剑(159)
鲁迅早期的个性主义及其对西方文学的绍介	
	郑松锟(171)
从译介俄苏文学中看鲁迅文学观的衍变.....	陈开种(187)
开拓者的“借鉴”与“创新”	
— 谈鲁迅与俄罗斯文学.....	王惠廷(199)

鲁迅怎样看待“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

..... 蔡清富 (212)

鲁迅与显克微支 王书声 (225)

鲁迅前期杂文艺术与中外文学 庄钟庆 (242)

试谈鲁迅前期杂文与外国散文的关系 任伟光 (254)

鲁迅与厨川白村及鹤见祐辅

— 关于鲁迅杂文理论主要渊源的探讨

..... 姚春树 (270)

鲁迅与日本白桦派 柯文溥 (286)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陈梦熊 徐重庆 (302)

鲁迅、增田涉答问新资料述稿 孙立川 (309)

鲁迅旧诗对我国传统诗歌的继承与革新 胡炳光 (339)

海峡彼岸作家心目中的鲁迅 包恒新 (350)

鲁迅的遗产走向世界

— 国外鲁迅研究概况掇拾 陈漱渝 (365)

后记 编选组 (1)

试论鲁迅的中外文化观

邵伯周

文化巨人之所以成为“巨人”，原因是复杂的。既能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又能放眼世界，从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并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为本民族的、也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应该说是重要原因。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研究并正确阐述鲁迅的中外文化观，在今天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中外文化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萌发，随着历史发展和他本人的实践过程而不断发展、成熟，进而达到马克思主义高度的，也是和他世界观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本文试从发展的角度分作三个时期对鲁迅的中外文化观作一比较研究。

“不擗”说和“别求新声于异邦”说

鲁迅结束家乡的私塾生活到南京读书，正是清朝政府被迫实行开放，逐步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鲁迅读书的矿路学堂，就是引进西方文化的产物。

在矿路学堂，格致、化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使少年鲁迅感到“非常新鲜”。课外，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以及《时务报》、《译书汇编》等书刊，使鲁迅接触到卢

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并且知道了“日本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①这样鲁迅就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文化。鲁迅是怀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和“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心情到日本去留学的。②在日本，他更广泛地接触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社会政治思潮、哲学思潮和文学。

在日本，鲁迅思索、研究了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民族国家盛衰的关系。一九〇七年撰写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表述了他的中外文化观。

鲁迅当时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是“不攘”，也就是不去触动人们的心灵，不要去启发人们改变现状。古代帝王，“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而民众呢，则“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因而一有天才出现打算启发人们的觉悟来改变现状时，帝王和民众都要竭力去扼杀他。鲁迅又认为诗歌最能触动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奋发起来改变现状，而诗歌又是消灭不了的，于是封建统治者就制订种种规范来束缚它。鲁迅指出：“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就是“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在这种儒家的“诗教”思想影响下，“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屈原的作品，鲁迅是给予很高评价的，认为“抽写哀怨，发为奇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同时鲁迅又指出：“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也就是缺乏对人民的鼓舞教

①《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②《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3页。

育作用。鲁迅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几乎没有。而当时的中国。“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不可能不变革。怎样进行变革呢？鲁迅把眼光转向西方。他指出：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这就是说，在鲁迅看来，要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奋发前进的国家，就必须洞悉世界发展形势，对各种新事物、新思潮，“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取其精神实质，使之适合于中国的需要。这样，既可做到与世界文化发展同步，又能保持民族传统。从这一认识出发，鲁迅提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张，多方位研究、引进西方文化。

在自然科学方面，首先，鲁迅引进、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不久，马克思就给予充分肯定，恩格斯也把进化论称之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1907年，鲁迅撰写了《人之历史》，论述了进化论学说的发展过程，指出生物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人类就是由猿类发展起来的。但是鲁迅并没有生硬地搬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没有把人简单地看成象生物那样，只是“适应”环境以凭“天择”。他认为人类是能够发挥主观能动精神进行战斗以求得

生存和发展的，现代人类的文明，就是从“生民之始”，经过“抗拒奋斗”发展起来的。①鲁迅引进、吸取进化论中的发展观点并加以改造，用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鼓舞中国人民奋发自强。这种历史观，可以称之为在斗争中求发展的历史观。

其次，鲁迅强调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在《科学史教篇》中论述了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在一些欧洲国家中，科学家和科学知识在抵御外族入侵，保卫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指出：

“科学者，神圣之光”，“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可以培育民族英雄，此乃“人文史实”所揭示的教训。基于这一认识，他撰写了《说铅》、《中国地质略论》等论文，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等，其目的就在于宣传科学知识，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②

在哲学思想方面。鲁迅引进尼采的“超人”哲学。鲁迅当时没有能够理解尼采“超人”哲学的实质，却误以为是一种新思潮的代表，可以用来克服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形成二十世纪的新文明。但重要的是鲁迅并没有把尼采的主张硬搬到中国来，而是“权衡校量，去其偏颇”，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欧美之强”，“根抵在人”，要使祖国“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

①《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6页。

②《（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2页。

神”。①在鲁迅看来，只要人们觉醒起来，奋发自强，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他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强调充分发挥个人的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希望通过“立人”的途径建立“人国”，从而达到使国家强盛的目的。

在文学方面：“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所以鲁迅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就强调需要文学艺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致人性于全”。从“立人”的认识出发，鲁迅弃医从文，因为他认为能够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提高人们觉悟的工具。“首推文艺”。他和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文学，目的就在于引进西方文学，使“异域文术新宗”，进入中国，使有识之士，“不为常俗所囿”，产生新的观念，新的思想。②他自己更以高度热情引进“摩罗”诗派。

鲁迅把欧洲的一些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诗人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称为“摩罗”诗派，认为他们犹如“撒但”，敢于造天帝反的“天魔”，也就是“精神界之战士”。鲁迅认为他们的诗篇都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的，具有“破坏复仇，无所顾忌”，“鼓吹自由，撞击压制”，“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革命精神。鲁迅热情地歌颂他们，把他们引进中国，介绍给中国人民，就是希望用他们的爱国思想，不畏强暴、力争自由的精神，来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激发中国人民的斗志；并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出现，启迪、引导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从

①《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4页。

②《城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5页。

而达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目的。①

总之，“不擅”说和“别求新声于异邦”说，体现了鲁迅早期不同的中外文化观：对民族的文化传统，更多地看到其消极因素，对外国文化，则更多地看到其积极的、进步的方面。这不无偏颇之处。但他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观点和具体实践，却为“五四”时期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开创了先河，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 ——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1925年1月，北京《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书目，鲁迅的答复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又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一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②鲁迅这里所说的“书”，不仅是指具体的书籍，可以看作泛指文化。

“中国书”，泛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和受到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中国旧文化，“外国书”则指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所以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从“五四”到1927年间鲁迅中外文化观的概括的表述。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社会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

①《摩罗诗力说》。

②《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还有“‘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对于这种种混乱现象和“二重思想”，鲁迅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认为“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拔去了‘二重思想’。”鲁迅又认为：“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 Plio。”①这就是说，在鲁迅看来，我们应该摒弃旧文化，引进西方文化。

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鲁迅着重批判其核心思想，即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狂人”尖锐地揭露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狂人”还因为发现自己也曾“吃”过人而悔恨，并要去劝转那些“吃人”的人，指出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存在。这是真正的“人”的觉醒。《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要求把妇女、儿童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样体现了“人”的觉醒。鲁迅还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所以他号召人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

①《随感录四十六、四十八、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32页—344页。

房”。①表现了鲁迅对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深恶痛绝。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正是中国旧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核心。

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鲁迅还着重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鲁迅愤慨地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②鲁迅指出：北洋军阀时代的议员“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而“大多数国民”，也“正是如此”。③鲁迅认为中华民国时代的社会，仍旧和五代、宋末、明末那样的黑暗、腐败，因而慨叹国民性的“难于改变”。④鲁迅还指出，中国人还有听天任命、中庸、惰性等“劣根性”，因而“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⑤鲁迅之所以要加以揭露、批判，就是为了要克服它。

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分散的、闭塞的、静态的小农经济所养成的国民的一种心态。这种国民心态，正是中国旧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基础。

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鲁迅还深入揭示其社会本质。

鲁迅指出：中国的旧文化，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和

①《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0页。

②《论睁了眼看》，《第1卷第237页。

③《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1页。

④《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⑤《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6页。

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对民众来说，是一把“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外国人称赞中国的文化，说他们在中国住得很舒服，“这就是中国人已经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外国人说他们“尊重中国的旧文化”，其实，“不过是利用”。所以鲁迅认为：“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整个中国，就会变成象上海租界那样的殖民地。怎么办呢？鲁迅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抛弃它。^①由此可见，鲁迅是把反对旧文化和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虑的，认为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大事。

“侍奉主子的文化”，真是一针见血，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其社会本质。

从深层结构批判中国旧文化，我们认为这就是鲁迅“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一论断的内涵。

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文化问题上，鲁迅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创造民族新文化，可以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凭空进行创造或把外国文化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事实恰恰相反。

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就默默地、深沉地埋头研究中国文化，用科学的态度整理中国古籍，挖掘其中的精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比如《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就是鲁迅从散轶的古籍中录出，经过严谨的校勘、编辑而成，其目的就是要汇集绍兴地区的“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

^①《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307页。